

1931年,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建立起了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在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博事业建设。其间,党和苏维埃政府广泛搜集和保护革命文物,并为此兴建了红军学校模型室、苏区中央图书馆、中央革命博物馆、红军烈士纪念塔等一系列建筑,为红色文博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一 红军学校模型室

二 中央革命博物馆

三 苏区中央图书馆

四 关于革命的各种物品

五 红军烈士纪念塔

中央苏区文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布告和决议案,宣传和发动广大军民搜集和保护文物。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中革军委内设的总政治部(后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以及所属工农红军学校,承担了编纂红军战史和死难烈士传略,收集其遗文遗物以为纪念、教育等任务。

工农红军学校除内设出版科,编印了许多政治、军事和革命理论书籍外,还特设红军学校模型室建设委员会,建立模型室。从模型室建委会征求各种模型启事的内容看,它已初具博物馆性质与规模。该启事公开刊登在《红色中华》上,内称:红军学校模型室为克服物质困难,拟制造并搜集军事政治文化上所需要的一切模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或军事委员会)、各红军部队、各革命团体等帮助收集各种模型图表等,赠送给红军学校。

红军学校模型室于1933年4月30日举行开幕典礼。室内有模型及图表600余件,其中以军事类的为最多,也最吸引人。模型室吸引了大批苏区军民前往参观,开幕当日就有4000余人入场,次日更是高达7000余人。

1933年5月25日,中央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签发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在《红色中华》同年6月29日的第2、3版中缝登载。启事称:中央教育部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暂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开始请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下列各种物品,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征集物品的名称,由于报纸影印件字迹不全而无法全部展示,可行的有:

关于革命的文件(1933年以前的):甲.标语(贴在壁上的标语,或标语稿本);乙.各种决议案、指示等;丙.传单、画报、杂志、报纸及政治简报等;丁.关于革命的印刷品或抄本;戊.统计图表。

唐代李翰《蒙求》作为古代启蒙教育阶段的教材,是一部“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投幼童”的童蒙教育书籍。在唐代以前,极为盛行且影响深远,又以其名取自《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故后世童蒙读物多以“蒙求”命名。然而由于此书原著早已失传,后世所见殆为后人补注,无法窥其原貌。

敦煌本《蒙求》为存世最早的《蒙求》抄本,本残卷开头17行为唐李良荐《蒙求》表,接下来的4行为唐李华《<蒙求>序》的部分内容,后为“蒙求”正文并注释,注明双行小字。它的发现不但可以复原唐代《蒙求》一书的原貌,还对考订此书的作者、时代及注文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帮助。

《蒙求》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

关于《蒙求》一书的作者,历来有“李瀚”“李翰”两种说法。最早关注敦煌本《蒙求》的研究者是王重民先生,他在《敦煌古籍叙录》中著录了李氏《蒙求》2件;王三庆《敦煌类书》“类句体之类书”一节中,也提及了敦煌藏经洞P.2710和P.4877两件《蒙求》写本;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中“敦煌写本知识类蒙书”一节在前人著录、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件敦煌本《蒙求》残卷进行了详细的著录与研究。李良《荐<蒙求>表》和李华《<蒙求>序》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据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祁晓庆介绍,关于唐代《蒙求》的作者、时代和注文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对作者时代的争论方面。根据《蒙求》在宋代书目中的著录次序,清代学者周中孚指出“李瀚”之说为误,该书作于唐代,作者应为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清光绪六年,杨守敬据日本古钞本《蒙求》指出,李华《蒙求序》及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证明《蒙求》的作者“李瀚”确系唐人。之后,文史学家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据以论证《蒙求》的作者及时代,明确指出《蒙求》的作者即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翰”“瀚”相通。

关于《蒙求》的作者,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存在‘李瀚’及‘李翰’两说,但均指出其为唐人。到了清初编修《全唐诗》的时候,才出现了《蒙求》作者‘李翰’为唐末五代人的说法。祁晓庆进一步补充道:“敦煌文献刊布后,学界进一步印证了余嘉锡的结论。2004年,傅璇琮先生在对《蒙求》的流传及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蒙求》的作者并非翰林学士李翰。此后,以唐变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傅璇琮的观点进行了发扬,西北大学李军教授对李瀚与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之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确认“李瀚”与“李翰”应为同一人。

早在苏区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和苏区的各级政府就已经认识到苏区图书馆的重要性。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攻下闽南重镇漳州,从漳州图书馆和龙溪中学等处收集到一大批图书。中央教育部便用这些图书在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叶坪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也称苏区中央图书馆)。

1934年1月13日的《红色中华》第3版发表了阮山所写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献给二苏大会的礼物——筹备中央革命博物馆》一文,该文称:中央教育部在积极地搜集各种各式有关革命历史意义与提高革命群众热忱的材料,准备在瑞金东郊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作为献给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褒扬先烈、永远纪念历年来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1933年7月11日第45次会议决定兴建的。

7月15日,“二苏大”准备委员会由主任梁柏台署名,发布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启事。中央苏区军民迅速掀起了为纪念塔募捐、向“二苏大”献礼的热潮。瑞金的红军指战员和工农群众纷纷行动起来,除了捐款捐物,还参加建塔义务劳动。

红军烈士纪念塔的设计工作,由时任中革军委总参二局(情报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担

任。进一步扩大藏书规模,曾号召团体或个人向馆里赠书。1932年11月7日的《红色中华》刊登的该馆启事中,将9、10两个月收到赠书的情况作了通报。

1932年11月22日的《红色中华》刊登的该馆启事,除告以“为着充分给革命工作的参考需要,和给予提高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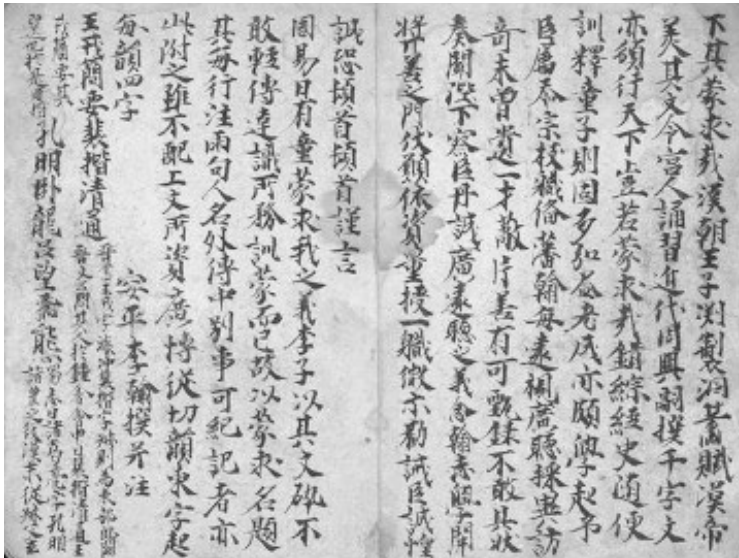
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的礼物。陈列内容,暂时约分10类:(一)世界革命领袖照片及其事迹;(二)中国土地革命历史的变迁;(三)中华全国苏区发展形势图;(四)牺牲烈士的遗像及其光荣事迹;(五)牺牲烈士纪念品;(六)红军和地方武装胜利品;(七)机关部队革命团

体。擅长书法和绘画的他,不仅设计了纪念塔,还设计了围绕纪念塔的一组纪念建筑,它们是:纪念牺牲于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的公路亭;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献身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的博生堡;以及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红军烈士纪念塔等烈士纪念建筑物,于1934年1月底竣工。粉饰一新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矗立在宽阔平坦的红军广场中央,炮弹造型的塔身宛如一柱擎天,宣扬着红军战士和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塔身上镶嵌的七块

被誉为唐代小学生启蒙教材

存世最早的敦煌本《蒙求》影响深远



敦煌本《蒙求》。

《蒙求》对童蒙教育有深远影响

《蒙求》原文分上、中、下卷,取经传史实故事,四言一句,现存版本共596句,2384个字,除了篇末最后四句外,每一句都讲一个典故,涉及典故592个。敦煌本李翰自注《蒙求》残卷正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起于“王戎简要,裴楷精通”,迄“鸣鹤曰下,土龙云间”,共50句。作为唐代撰写而成的一部童蒙类读物,在唐宋时期影响巨大。唐代文宗李华曾在所作序言中写过一句话,“不出卷而知天下,其《蒙求》哉”,在此基础上,李良的推荐语中也说,“汉朝王子泉制《洞箫赋》,汉帝美其文,令宫人诵习。近代周兴嗣撰《千字文》,亦颁行天下,岂若《蒙求》哉!错综经史,随便训释,童子则固多弘益,老成亦颇览起予。”

“蒙求体”蒙书教材具有显著的教育功能。祁晓庆认为,“从时代上看,《蒙求》上承《千字文》,下启《三字经》,在篇幅和知识含量上,相对于两者却有过而无不及;从流传范围看,该书不仅远播敦煌,更是在唐末之际成

为日本皇室的读本。”作为唐代撰写而成的一部童蒙类读物,《蒙求》在唐宋时期影响巨大,《资暇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均有所引用或著录。经过历史沉淀,“蒙求体”以其文化的博深、体裁的新颖、理解的简易,既有传承文化的意义,又有教化的道德价值。

“蒙求”强调的是激发蒙童主动求知的欲望,以及主动求索的内在动力,而非通过外界力量来迫使童蒙去学习。书名《蒙求》的含义也与书中所叙内容和体例相符,即一句一个典故或者一联一个典故,这些典故背后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要想弄懂这些知识,孩童必须去主动查找和学习,这个过程就是激发童蒙主动探索和学习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蒙求教育由最初的识字基础教育,逐步转入历史、常识和德育类教学,既有助于文化知识的传承,又能培养儿童的兴趣和综合能力。“利用贴近生活的文史掌故和生活常识,对儿童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敦煌本《蒙求》补充了蒙学教材的内涵,也使得教学更为方便。”祁晓庆补充道。



(据《华西都市报》)

读史忆人 典故 张爱玲和民国小报

民国时期,有一种小型的报纸,简称小报。小报的内容多数以消闲和趣味为主,是反映民国时期城乡风俗民情、社会文化的通俗报纸,其读者大多是中下层的市民。民国时期的小报大概有1000多种,可谓洋洋大观。

1945年7月21日,女作家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民国时期的小报:“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还有一个特点:不论它写什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它自己。总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作者的面目,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所以我看小报的同时也是觉得有研究的价值。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有时候漏了几天没送来,就耐不住要跑到报摊上去翻翻……”这段话是张爱玲在参加杂志社主办的座谈会时谈到的对小报的见解。

张爱玲还在小报上发表了不少的作品,她的《郁金香》《天地人》《罗兰观感》《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秘密》《丈夫的心》都是在小报上发表的。

张爱玲的《天地人》发表在1945年4月15日上海的《光化日报》这张小报上。《光化日报》从1945年4月14日创刊到1945年9月18日停刊,只存在了5个月零4天,却是一张很出色的小报。当时,张爱玲、柯灵、苏青、潘柳黛、程育真、张婉青等许多有名的作家都为之撰稿。

民国时期诞生了许多小报,正是这些小报,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人既是报人,又是记者,既是读者,又是作者,他们在民国时期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倾注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许多令人回味的故事。(据《人民政协报》)

拾遗 山中宰相

山中宰相,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朝梁时陶弘景,隐居茅山,屡聘不出,梁武帝常向他请教国家大事,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

梁武帝萧衍没有做皇帝前,就和陶弘景是好朋友。萧衍初夺得大权预备立国,但取什么朝代名称,一时打不定主意。陶弘景根据当时流传的童谣和预卜吉凶的书籍,说其国号应当是“水刃木处”,拼起来是“梁”字,萧衍采纳了他的建议,定国号为梁。事后,萧衍感谢陶弘景,派人进山慰劳,同时也让陶为他炼些丹药。史书上称当时武帝对陶弘景“书问不绝,冠盖相望”——书信、问候不停传递,使者车辆在途中一辆接一辆,可以相互远远地望见。武帝知道陶弘景是个奇才,几次想请他出山做官,但陶坚辞不出。诏书来得急了,陶弘景就画了两头牛让人带去呈给武帝。画中一牛散放在水草间,一牛则被加上了金笼,有人执着鞭子在驱赶它。武帝一看,明白了意思,笑着说道:“这人没有什么荣华富贵的欲念,看来是打算仿效在泥潭中拖着尾巴自由爬行的乌龟(语出《庄子》,比喻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只是有军国大事,仍然派人咨询,“山中宰相”的名声便是这样形成的。

(据《新华日报》)

“渴睡”原是“貉睡”之误

欧阳修《六一诗话》记一趣事:“吕文穆公未第时,薄游一县,胡大监旦方随其父宰是邑,遇吕甚薄。客有誉吕曰:‘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胡问诗之警句,客举一篇,其卒章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语胡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既而次榜亦中首选。”

北宋名相吕蒙正谥文穆,故称“吕文穆公”;胡旦曾任将作监丞,故称“大监”。“薄游”指为微薄的俸禄而宦游于外。两人的交往正发生在吕蒙正“薄游”的时期。吕蒙正头一年状元及第,胡旦紧接着第二年也状元及第,真可谓一时佳话。“渴睡汉”也从此成为吕蒙正的谑称。

先辨析一下同义词“瞌睡”。“瞌”从目从盍,“盍”表声兼表意,本义为覆,为合,合目当然就是睡觉了。明代字书《正字通》解释说:“人劳倦,合眼坐睡曰瞌睡。”

而“渴睡”一词,很容易被人误解成非常渴望睡觉,但其实“渴睡”应该写作“貉睡”,是貉这种动物要睡觉。貉是一种外形像狐狸的哺乳动物,穴居于河谷、山边和田野间,杂食鱼、鼠、蛙、虾、蟹和野果、杂草等,拔去硬毛的貉子质地地轻软,是珍贵的毛皮。同一山丘上的貉叫作“一丘之貉”,比喻彼此同是丑类,没有什么差别。这当然是对“貉”这种动物的污蔑。

李时珍则在《本草纲目》中辨析过“渴睡”这一俗语的误用:“貉生山野间。状如狸,头锐鼻尖,斑色。其毛深厚温滑,可为裘服。与獾同穴而异处,日伏夜出,捕食虫物,出则獾随之。其性好睡,人或蓄之,以竹叩醒,已而复寐。故人好睡者谓之貉睡,俗作渴睡,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聋也,故见人乃知趋走。”(据《天津日报》)

唐代“高考”曾延期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夏秋之际,各地解试已毕,但因为“虫旱相因,恐致灾荒”,尚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及殿试,用当时的话说,叫“权停贡举”,一时舆论哗然。

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半年后在天子脚下的考试?原来,按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运送本地举子进京的时间,因秋收受损,物力不迫,耽误了部分地方举子的行程。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季才开始,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觐见天子、拜谒先师、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因此,朝廷提前半年发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张。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情,“念彼求名之人,必怀缺望之志”,于是“宁违我令,以慰其心”,下诏恢复次年春闱,只是将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好等待那些在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的栋梁。

(据《天津日报》)